

新書介紹

李仙得《臺灣紀行》

作者 | 林欣宜助理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作者：李仙得 (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

主編：費德廉 (Douglas L. Fix)、
蘇約翰 (John Shufelt)

譯者：羅效德、費德廉

出版機關：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ISBN：978-986-03-8069-9

出版日期：2013年9月

《臺灣紀行》，顧名思義，為作者李仙得（中文文獻中又名李讓禮、李善得等）於1860年代底至1870年代初之間幾次來臺從事外交斡旋與事件調查之行旅觀察，但不採紀年方式歷敘各次旅行，而是自立事件式主題，夾敘夾議地以27個章節分述，附上豐富地圖、照片與插畫作為補充。原書稿在1875年成書後，在種種顧慮下終究未能付梓，殘本及日文譯本與相本存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地，幾年前曾有節錄本在日本及臺灣兩地出版。去年（2012年）李仙得的《臺灣紀行》（英文原本），終於在兩位編者長年奔走海外各地收集、比對、校註之下集結出版，受到國內外學術界之矚目，是一百三十餘年後始得問世的全校本。今年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再接再厲，繼續推出中文譯本，讓國內及華文圈讀者，更容易一窺這位在19世紀下半葉於亞洲各地引發風暴的人物之世界。

一般咸認李仙得以外交使節身份在此期間遊走東亞各國，為帝國主義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

1867年羅發號事件及1874年協助日本入侵的牡丹社事件，尤為李仙得最廣人所知之事蹟，本書亦有不少直接與之相關的記錄，可視為重要關係人的說帖，亦為理解當時中外角力的關鍵文獻。關於李仙得及其所著《臺灣紀行》的重要性，本書的導論已有非常精闢之討論，在此不加掠美，謹就中譯本稍做介紹，以期此書問世後能對未來臺灣歷史研究發揮積極而正面的影響。

為了讓讀者更能理解本書內容及其書寫之背景，在英文版出版時，兩位主編撰寫了共三篇導論，分別針對文本本身與書中所收錄較其他同時代書籍為多的圖像類資料做說明：首先，蘇約翰討論李仙得在當時東亞時勢下編纂《臺灣紀行》一書的背景，推論此書被書寫、編纂與準備出版的來龍去脈，及其體例與性質等等；第二篇由費德廉對《臺灣紀行》中所收錄照片的型態、種類、目的、攝影者以及與李仙得的關係進行討論，考察了19世紀東亞攝影技術史的進展，及臺灣與西洋攝影家的關聯；第三篇費德廉以李仙得委託日本插畫家小林永濯製畫之緣由為起點，考察小林本人之生平與其藝術表現的階段性變化。

今年，在中文版面世之前，蘇約翰教授新撰了一篇“Charles W. Le Gendre—Biographical Notes”，即本書同時收錄的〈李仙得略傳〉，則讓讀者有驚艷之感。本文不但是蘇約翰教授長年以來的研究心血結晶，也是國內外迄今為止，對李仙得個人生平最詳盡的一篇說明。以往，李仙得以擴張主義之思想，公然以美國領事的身份，鼓動列強進行軍事侵略與外交干預之舉，搏得昭彰惡名。然而，在此論點之外，對於李仙得個人生命歷程、其在日本及在韓國的經驗，研究仍嫌不足。蘇約翰這篇文章解決了這些問題，並將其法國成長、與美國女士結婚定居異鄉、在美國從事軍旅、身體受損、步入外交生涯、後半生在東亞外交圈遊走等等事蹟，搭配其家庭背景、家族與婚姻生活、親子關係、離鄉背景建立新家庭、職業生涯的挫折與國籍選擇造成的疏離感等等面向，討論了李仙得孤傲一擲的個性，及其在美國土生移民保護主義興盛的環境中，不被認可的孤獨感之間的關聯，十分具有新意與說服

力。總覽本書，確實，不難發現主角李仙得的觀點經常異於下述諸多19世紀末關於福爾摩沙的書寫，有時會流露出令人不解的「正義感」，例如：不在意對臺灣人推動基督教義的必要與急迫性，卻認為有權對原住民所在區域維持清朝政府無法執行的正義公理等等，如果看了蘇約翰的文章，便不難理解其心路歷程。

過往數十年的19世紀臺灣歷史研究，集中在官方材料的研讀與詮釋，利用外國人留下資料之比例相對較少，然而，此一時期的臺灣歷史實與外國人息息相關，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開港、牡丹社事件、中法戰爭，到中日戰爭，在臺灣史或中國近代史上通常都被視為一連串列強侵略、逼迫中國讓出利權、忍辱吞聲的歷史。最近數十年來雖不乏強調清末自強維新、開港促成經濟成長或劉銘傳新政等洋務運動對於近代化的貢獻，展示出貌似弱勢的被侵略者也有其主動回應能力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外部衝撞與主動反擊的二元角度之外，李仙得《臺灣紀行》及相關外國人材料還可以發展出何種研究視野呢？

細繹19世紀末外國人對臺灣（或更常見的稱呼是福爾摩沙）歷史、社會與文化的書寫，有幾部當時即已出版的西文作品，對世界認識福爾摩沙的知識建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計單篇論文的話，與李仙得同時期出版的依序便有豪士（Edward House）的*The Japanese Expedition to Formosa*（1875）、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的*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1878）、陶德（John Dodd）的*Journal of a Blockaded Resident in North Formosa during the Franco-Chinese War, 1884-5*（1888）、必麒麟（W. A. Pickering）的*Pioneering in Formosa: Ref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and Head-hunting Savages*（1895）、稍晚的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的*Sketches from Formosa*（1895）、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的*From Far Formosa*（1895）、里斯（Ludwig Riess）的*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臺灣島史，1897）、Albrecht Wirth的*Geschichte Formosa's bis Anfang*（臺灣之歷史，1898）、戴維遜（James Wheeler Davidson）的*Taiwan: Past*

and Present (1903) 等等，這些書籍皆有中文譯本，對我們理解19世紀下半葉開港以後臺灣各地的歷史發展，提供了異於清朝官方文獻之外的另一種觀看臺灣的角度。外國人撰寫的福爾摩沙歷史是從不同立場與脈絡留下的記錄，這些人士在帝國主義前緣之外，對其所駐地方的觀察與影響，往往與他們來到遠東的目的（大多為傳教、通商或外交工作）及交遊網絡（他們背後或各有教會、商行或國家組織的支援，並非單打獨鬥）有關。正因為這些人是外國人，對臺灣一知半解，或完全沒有聽說過，對於異地及種族的感受十分敏銳，而且，普遍來說，都對其所派駐地區的歷史感到興趣，因而比起許多其他同時期中文的史料，更能夠傳達出臺灣整體的、全面的、長期的歷史面貌，就像李仙得《臺灣紀行》為臺灣保存了19世紀最早的照片，數量還不算少。甚至，有些時候，要在這樣的回憶記錄中，才見得到清代臺灣人的生活，他們的人種、語言、食衣住行、信仰、嗜好、感受等等，這些對當時臺灣社會生活實態最寶貴的第一手觀察記錄，便是這些外國人資料迥異於為數眾多卻多滿是「官話」的中文文獻的最大特色。

這樣的新興研究取向，似乎也感染了歷史類書籍之出版市場。近年來臺原、前衛、玉山社等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19世紀末來臺外國人士著作之中文譯本，較為大眾化，文字淺白、大量使用相近主題但非原書所附照片等圖像，如日本時代初期開始大量出現的明信片、寫真帖等照片，作為供一般讀者理解的補充資料。相較之下，本書之訴求對象明顯不同，嚴守著高規格的學術標準，對於文中出現的人事時地物做足了學術史的考證，除了作者李仙得自己的註腳外，兩位編者將近年來學術研究成果、考證發現、疑問及說明等等都放在每一章節的最後。在翻譯上，編譯者為了達到盡近準確的要求，譯文十分貼近原文。除非必要，每有異動都加註說明。翻譯及更動的原則在導論第一篇〈關於文本的介紹〉一文中加以說明。除了文字部份之外，書中所引插圖、照片、畫作、合成模型圖、地質剖面圖、地圖等等都做了深入考究，擺放的位置也參酌原稿放置。只要稍微瀏覽過書末六個附錄中收錄的人名、地名、組織詳解、行



書中所附的插圖與照片

程記錄、收錄照片與繪畫、地質圖等等之列表、重新編製的李仙得行程地圖等，便可以得知兩位編者的學術功力及全力以赴的認真態度。

總的來說，《臺灣紀行》一書，可以稱得上清末外國人士對臺灣整體書寫的第一部，在一百多年後才問世的今日，終於應該可以還其公道。考究其書寫脈絡與對臺灣的認識，可以讓臺灣在19世紀成為列強競逐對象的歷史再度更加清晰，從東亞綿密交錯的國家、社會與商業的不同網絡，來看臺灣在東亞的位置，將可提供異於以往的全新視野。